

# 梁啟超與近代報業

● 賴光臨（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）

## 肯定報刊傳播功能

中國近代出色的報人，首推梁啟超，在近代報業史上，他促進報業的提升與發展，所做的貢獻最大。

在梁啟超辦報之前，主持報章筆政的，大都是功名失意的落拓文人，無新思想、新知識，每天寫一些捧戲院名角的「文評」，吟幾首讚美青樓女子的詩詞，以發洩無聊的意興。因而報章風格低劣，在社會一般觀感中，報紙是誨淫誨盜的媒介，家長們都禁止子弟閱讀。

但梁啟超辦報之後，論政紀事，規模漸具，報紙開始作脫胎換骨的轉變。此後政治的變革，社會的變遷，無一不是由報章作啟發的動力，在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。社會對報人和報章的眼光，至是截然不同。

一部中國報業史，「梁啟超」三字，儼然成為劃分新舊報業的「界碑」！

梁啟超十七歲在鄉試高中舉人，廿四歲辦時務報，為從事報業生涯的開始。當時辦報被社會大眾認為是「莠民賤業」，梁氏以科場貴人，而

放下身段投注心力，這其中原因，或可分兩方面論述：

一是受康有為影響。梁啟超十七歲拜康氏門下，孜孜於學凡三年。此一萬木草堂時代教育，為他一生學術與事業奠立下基礎。

康有為草堂講學重宋明義理之學，他自述「與諸子日夕講業，大發求仁之義，而講中外之政，救中國之法。」每談及國事阨阻，民生憔悴，外侮侵陵，常常慷慨太息或至流淚。這一批青少年在康氏薰陶之下，一方面跳出訓詁詞章舊學的窠臼，開拓思想識見；一方面則激情盪漾，凜然於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之義，而興起用世的懷抱。梁啟超寫「三十自述」，其中有一段話：「余生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，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，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，普法戰爭後三年，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。」他以自己出生年歲，與歷史名人與大事相繫，反映了他用世的熱忱與對事功的嚮往。

廿三歲入北京，見國事日非，便漸有慷慨激昂之態。這年夏秋之間，康有為發起創立強學會，並發刊中外公報。梁啟超協助奔走，主持報刊

筆政，從此決定了辦報的心志。

二是藉報刊啟迪民智、開通風氣。時滿清政治腐敗，復習於保守，憚於改革，總認是成法為不可踰，舊章為不可改，陳陳相因，蹈故守常，扼窒國家生機，挫折國人期望。

康有為主張變法，曾先後七次上書而不克上達，到第四次之時，維新人士都有一番覺悟，本身既未掌握尺寸權柄，自無法推動革新事業，期變法於朝廷，幾絕無可能，因而回轉頭來倡之於下，以開啟民智、開通風氣為務。

梁啟超抱持一種觀點，認為民間風氣與國家政事兩者之關係，猶如空氣之與寒暑表，空氣之冷熱燥濕，表之升降隨之，風氣未開，人才未備，一切新政無法舉行。

他們心目中振刷國民精神的新事業，一為學堂，一為報館。梁啟超致書友人夏穗卿，曾說：「頃欲在都開設報館，已略有端緒，此學有成，其於重心力量頗大也。」又說：「此間亦欲開學會，頗有應者，然其數甚微，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，報館之議論既浸漬於人心，則風氣之成不遠矣。」

上述文字，說明梁啟超之重視報刊，並對其傳播聲氣，擴大影響的功能，寄以信心與肯定。

## 辦時務報名重一時

梁啟超一生主持的報刊不下十個，比較重要的有下述幾種：

1. 時務報：於光緒廿二年（一八九六年）七月一日在上海創刊，是為維新派之正式言論機關。梁啟超為文論政自「時務」始，其名重一時亦自「時務」始。

時務報特色，一在內容：廣譯五洲近事，詳錄各省新政，博搜交涉要案，使讀者周知全球大勢，熟悉本國近狀，開展視域，增廣知識。「時務」取名，實含寓意，以社會教育使命自負。

另一項特色在言論：梁氏倡言變法維新，以突破守舊觀念，時梁氏於西方民權之說，涉獵未深，兼以政治環境禁忌，所以，當時他的變法思想歸結於變科學、興學校，以培育人才為本。但已是議論明通，足資激發志氣，使讀者驚訝讚嘆。時務報每一冊出版，風靡海內，「學國趨之，如飲狂泉」，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。此後，沿海新報競起十餘家，面目體裁完全模仿「時務」，梁氏已儼然建立輿論權威的地位。

2. 清議報：光緒廿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十一月在日本橫濱創刊。

清議報發刊的宗旨，標明有四：一、維持支那之清議，激發國民之正氣。二、增長支那人之學識。三、交通支那、日本兩國之聲氣，聯其情誼。四、發明東亞學術，以保存亞粹。

時在戊戌政變之後，清議報強烈批評清廷，特別是對慈禧太后、榮祿、袁世凱諸人。梁氏自承，該報「明目張膽，以攻擊政府，彼時最烈。」西方學者李文遜（Joseph R. Levenson）甚至認為，清議報最大目標，是在使光緒帝「復辟」。

清議報特色，有下列四項：

一是倡民權：「始終抱定此義，為獨一無二之宗旨。」

二是衍哲理：「讀東西諸碩學之書，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。」

三是明朝局：「指斥權奸，一無假借。」

四是厲國恥：「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，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……疾呼而棒喝之，以冀同胞之一悟。」

清議報內容分六門，為（一）支那人論說，（二）日本及泰西論說，（三）支那近事，（四）萬國近事，（五）支那哲學，（六）政治小說。重要篇章，有譚嗣同的「仁學」，「實禹域未有之書，抑眾生無價之寶」。章炳麟的「儒術新論」，「詮發教旨，精微獨到」。梁氏自撰「飲冰室自由書」，張自由平等主義，「以精銳之筆，說微妙之理，談言微中，聞者足興。」

清議報以內容勝過其他刊物，成為中文雜誌的翹楚。

3. 新民叢報：光緒廿八年（一九〇二年）元月創刊。「新民」一詞，取「大學」新民之義。

梁啟超標揭其宗旨說：「欲維新我國，當先維新我民。中國所以不振，由於國民公德缺乏，智慧不開，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，務採合中西道

德以為德育之方針，廣羅政學理論，以為智育之原本。」

## 言論思想煥然一新

梁氏著「新民說」，凡十餘章，包含：論新民為中國今日第一急務、論公德、論國家思想、論進取冒險、論權利思想、論自由、論自治、論進步、論自尊、論合群、論生利分利、論毅力等篇，貶傳統觀念之缺失，衍西方文化之精理，思想煥然嶄新。

該刊計分廿五門類，大量介紹西方學者及其學說，計有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說、進化論革命者頤德的學說、樂利主義泰斗邊沁的學說、法理學家孟德斯鳩與天演學初祖達爾文等的學說。內容以繁富見稱，一紙風行，銷售處分佈國內外四十九縣市，計九十七處，且遠至雲、貴、陝、甘等地，誠有無遠弗屆之勢。而「每一冊書，內地翻刻本輒十數，」青年競喜讀之。蔣夢麟是「千萬萬受其影響的學生之一」，稱譽新民叢報是「當時每一位渴求新知的青年的智慧源泉。」

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時代，發揮的影響力最大。嚴復論梁氏文字煽動力量有云：「主暗殺則人因之而惘然暗殺，主破壞則人又群然事為破壞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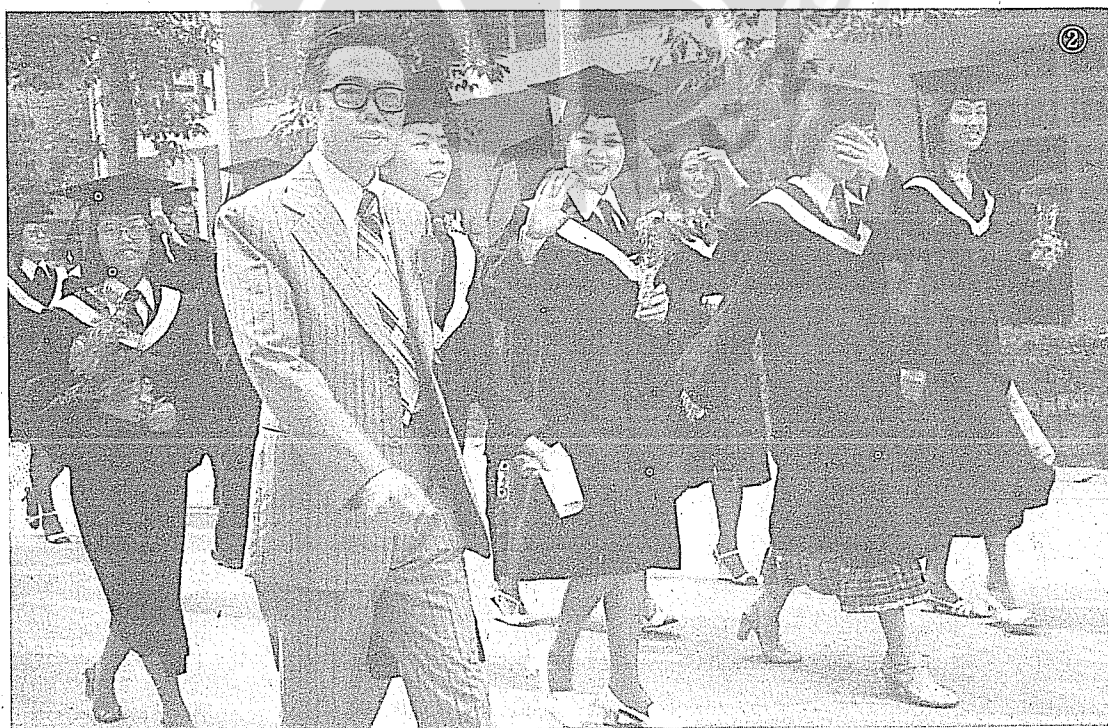
史學家李劍麓亦說，壬寅癸卯（一九〇二—〇三年）時期，梁啟超儼然為「言論界之驕子」。而啟超自謂：「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，均蒙其影響。」

分析他所以對知識青年具有如此影響力，原因似有兩項：一是梁氏文字平易暢達，條理明晰



①作者（中立）在新聞教育座談會中致詞時留影。

②作者（左）率領政大新聞系畢業生繞遊校園時的情景。



，筆鋒常帶感情，對讀者別有一種魔力。而議論則趨重於突破現狀，時外侮日逼，內治腐敗，青年心理咸醞釀打破現狀意識，有觸即發，遇啟超聲情激越的文字議論，未有不投袂而起。二是梁氏報刊除政治論著外，並大量介紹西學新知，受舊式教育的青年，得讀此刊物，眼前頓呈現一萬象森羅的新世界，未有不歡欣激動。

祇是一九〇三年冬季，梁啟超遊美返日，思想言論發生一急劇轉變，排斥共和，反對革命。至一九〇五年由之引發革命黨與保皇黨的文字論戰。兩黨各以新民叢報與民報為言論機關，針鋒相對，壁壘森嚴，三年之間論戰之文不下百餘萬言。結果，梁氏立憲論的聲勢，不如革命論的浩大，因反革命言論與青年突破現狀的心理相違背。楊度致書梁氏，即直言：「若未駁革命黨，批評國民，實為失策。」胡適認為，梁啟超的文章，帶著濃摯的熱情，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，不能不跟著他想。有時候，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，還想望前走，他倒打住了，或是換了方向走了。這種時候，我們不免感覺失望。」

唯新民叢報與民報的論戰，於國民政治思想的開放進步，有其高度評價與貢獻。梁氏一些觀點，證之後來史實發展，可說不失其透闢與前瞻識力。

新民叢報因經濟不支，於光緒卅三年（一九〇七年）七月停刊。梁氏曾自作評述：「本報自壬寅年開辦以來，于茲兩載，其條例精密，議論嶄新，為國民之警鐘，作文明之木鐸，且開我國叢報之先河，居我國叢報界之魁首。此海內外君

子之所公認而無庸再贅者也。」衡之事實，並非誇大之言。

## 國士精神移植報業

梁啟超以士人身分與報業結合，創造了「新報業」，並表現下列幾點特質：

一、是「天下為己任」的國士精神：傳統士人有一份入世襟懷，宋代范仲淹「岳陽樓記」有一段著名的文字：「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……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，是進亦憂，退亦憂。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乎？』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」這份莊敬自持的態度與志懷，不因際遇困頓而挫折，國學大師錢穆以「秀才教」譽之，以宗教家的虔誠與熱忱比擬。而前人影響後人，淪假成為士人的高貴傳統。

傳統士人的憂懷，表現為問政的積極態度，對當政者作諫諍，並認這是「天」授予的責任。而這份責任感，一依道德理性而發，甚至於罔顧一己的安危後果。范仲淹作「靈烏賦」，有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的壯語，即是這一精神的闡揚。

甲午中日之役締訂馬關條約，中國以地廣人眾，敗於扶桑三島，割地償金，為世大辱。士人熱血沸騰，滿腔孤憤。梁啟超當時有詩云：「恨飲且浩歌，血淚忽盈眶。哀哉衣冠儒，塗炭將何極！」表現沉痛心懷。

其後梁氏創辦時務報，著「論報館有益於國事」一文，自述辦報的心意。他說：「雖愚蟲之

力，無取負山，而精禽之心，未忘填海。上循不非大夫之義，下附庶人失諫之條；私懷救火弗趨之意，迫為大聲疾呼之舉。見知見罪，悉憑當途……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，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。」所激於國家危殆、救亡圖存義無返顧的心境，躍然紙面，無形中將高貴的國士精神移植於報業。

## 求新求變進取創新

二、是求新求變的進取觀念：梁啟超創辦報刊，重視對大眾的教育作用，要將新思想、新觀念、新知識貢獻於同胞之前。

時社會風氣閉塞，多數知識階級，猶如處閨室，坐習井，膏然不知外事。百年以前法國革命，美國獨立，全球千古未有的大事，而中國無一人知其影響。至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普法之戰、俄土之戰，同為歐洲非常之舉，而中國之稱先覺者，僅聞其名，若有若無。

知識階級既於外界一無所知，故思想窒有，即使有所思有所想，亦無以越古代經典範圍，乃養成好古保守的習性。

顯然，梁氏的報刊，所提供的「新」與「變」的訊息，猶如在密閉的暗室中開鑿一扇窗戶，使生息在暗室內的人，得以擴大視域，看到外在燦然景觀，於是對外求索之慾日熾，對內厭棄之情日烈。

張之洞「勸學篇」一文，對此曾有極扼要中肯的論述：

乙未以後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，廣譯洋報，



①

①筆端常挾感情的名報人梁啟超。

②戊戌政變三主角：保皇黨首領康有為（右）、光緒皇帝載湉（中）、名報人梁啟超（左）。



②

參以博議，始於滬上，流衍於各省，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。雖論說駁雜不一，要可以擴見聞，長志氣，滌懷安之耽毒，破捫籥之瞽論。於是一孔之士，山澤之麓，始知有神州；篋篋之吏，煙霧之儒，始知有時局；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。

國人眼界開闊，觀念轉新，一個傳統社會遂開始轉變。其後九十年間，幾件歷史性的大事，如戊戌維新、辛亥革命、五四新文化運動，無不以新求變為動源，以新聞事業為觸媒。

### 專業信守四項原則

三、是專業的道德信守：舊時報紙記事常閉門以造，信口以談，論說則毀譽一憑恩怨，甚至「揚頌權貴，為曳裙之階梯；指斥豪富，作苞苴之左券。」所為所行，令人不齒。

梁啟超對報業有深入的觀察，於其弊病感慨抨擊之餘，對報刊的論說記事輒作積極的主張。有關論說方面，提出「公、要、周、適」四點原則：

公：不偏徇一黨之意見，鑒乎挾黨見以論國事，必將有辟於親友，辟於所賤惡，非惟自蔽，抑其言亦不足取重於社會也。

要：凡所討論，必一國一群之大問題。

周：凡每日所出事實，其關於一國一群之大問題，為國民所當措意的，必次論之。

適：雖有高尙之學理，恢奇之言論，苟其不適於中國今日社會之程度，則其言必無力而反以滋病，故同人相勗，必度可行

者乃言之。

有關記事方面，梁氏於時報發刊時，為之手訂記事刊例五條：

博：務期材料豐富，使讀者不出戶而知天下

速：凡遇要事，必以電達，務供閱者先睹為

快。

確：凡風聞影響之事，概不登錄。若有訪函一時失實者，必更正之。

直：凡事關大局者，必忠實報聞，無所隱諱

正：凡攻訐他人陰私，或輕薄排擠，借端報復之言，概嚴屏絕。

上述梁氏所訂原則，實為報人所宜恪守的職業信條，可稱為中國報界的首次成文道德憲章。

梁氏明瞭報刊勢力的不可輕侮，責任的艱巨，因而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凜然生畏敬之感，所以立言記事，特重「保其為社會所信仰」，以求自保令譽，自尊人格，自重價值。

道德信守為現代專業的要件，用以建立是非判斷的標準。近代新聞學者更指出，新聞倫理道德的宏揚，具有雙重目標：一是維護自由，一是擔當責任，而自由與責任，為新聞事業生存與發展的基石。士人以高尙人格滲入報刊之中，形成光輝耀射的報格，反映了新聞學者所揭櫫的專業道德理想。

### 樹立近代報人典範

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，梁啟超可說是一位成

功的報人，先賢「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」，他確為新聞界樹立了可資欽敬的典範。

現從識見、學問、風骨三方面論述：

#### (一) 識見

清末社會風氣未開，做報被認為是文人末路。梁啟超獨排世俗觀點，對報業有另一番透闢認識，他說：

報業者，實蓋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，或大或小，或精或粗，或莊或諧，或激或隨，而一一介紹之於國民。故報館者能納一切，能吐一切，能生一切，能滅一切。西諺云，報館者，國家之耳目也，喉舌也，人群之鏡也，文壇之王也，將來之燈也，現在之樞也。偉哉！報館之勢力。重哉！報館之責任。

報館之責任為何？他歸納為兩點：一曰反映輿論，發揮輿論，監督政府；一曰提供真理與事實，嚮導國民。

梁氏復強調思想、言論、出版三大自由，慨言中國之腐敗，惟其大原，皆必自奴隸性來，不除此性，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。

壬寅年正月，發表「保教非所以尊孔論」，抨擊保教主張束縛國民思想，與康有為意見大相反對，雖經函札勸導，梁氏仍堅持「自由」一義，未嘗稍懈。他認為西方各國文明，日進月邁，由昔觀今，「殆如別闢一新天地」，即是三大自由所結之碩果。此三大自由「是一切文明之母」。

梁啟超基於自己識見，瞭然於報館勢力與實



左起：梁啟超、梁思莊、林徽因在長城合影。

任，因而對所從事的事業自勵自勉，孜孜矻矻，不斷的朝向理想目標努力。在他心目中，理想的報章必須合乎四項條件：

一、宗旨定而高——為報館者必須以熱情慧眼，注視一最高宗旨而守之，這是「定」；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，這便是「高」。

二、思想新而正——取萬國新思想以貢獻同胞，唯在選擇上必須察本國原質，審今後時勢，鑑定確為有利而無病。對於古來誤謬思想，則予摧陷廓清。

三、材料富而當——全世界知識，報章無一不刊載。而閱一字則得一字之益，不使有所掛漏，有所缺陷。

四、報事確而速——報館應不惜重貲以求新事，因報紙對讀者的惠益，以「知今為最要」。

梁氏標揭的這份理想藍圖，對於當時幼稚的中國報業，產生了很大的導引、激勵作用。即在今天，同樣也可作為辦報刊的南針。

由透關的認知，產生誠敬的信念，進而致力開拓理想——這便是卓識。

## (二)學問

梁啟超一生多采多姿，是一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史學家、文學家，並是一位卓越報人，學問的淵博，在近代報人中，還未見出第二位。

根據他的友人徐佛蘇作保守估計，梁氏著與述兩者總和，達一千四百萬字，著述之多與範圍之廣，堪稱前無古人。

梁氏學問所以淵博，最主要因素，見之於他自己所說的一句話：「學問慾極熾」。不但所嗜

種類繁雜，而且每治一種學問，輒全心沉溺。

他在青少年時代，即孜孜於學。十九歲入萬木草堂，彼時求學情形，有下面一段記述：

先生（康有為）每逾午，則升堂講古今學術源流，每講輒歷二三小時，講者忘倦，聽者亦忘倦。每聽一度，則各各懷喜踴躍，自以為有荊獲，退者則輒譚然有味，閱久而彌永也。

他上課專心聽講，多增一分知識則滿懷酣暢，下課後則能深入尋味有所省發，具見這位青年學子的好學深思，與所奠立的紮實學問基礎。

戊戌政變發生，梁氏廿七歲，逃亡日本。他已是一位名聞國際的人物，然而好學之心，愈見熾烈。是年春，他特約朋友羅孝高同往箱根讀書。時日本維新已三十年，翻譯西方著作，不下數千種，梁氏恣意瀏覽，歡欣之情，溢於言表。他自述：

哀時客既旅日本數月，肄日本之文，讀日本之書，嚙昔所未見之籍，紛觸於目，嚙昔所未窮之理，騰躍於腦，如幽室見日，枯腹得酒，沾沾自喜。

這位哀時客抱持一種見解：一個人無學問，則不足以擔當救國的責任。他寫信給老師康有為說：「吾不解學問不成者，其將挾何術以救中國也。」因而，有一段時期，他覺得自己「所學未足，大有入山數年之志」，即是入山潛心讀書。

只是彼時的維新事業，不容許他擺脫。但這份重視學問的心意，具見這位青年報人的惕厲奮發。

據梁氏自己分析，他治學有兩大缺點：一是無恆，每治一業，過些日子便放下。二是愛博，

任何一門移時而拋，所以入焉不深。他曾題詩給女兒自侃：「吾學病愛博，是用淺且蕪。尤病在無恆，有獲旋失諸。百凡可效我，此二無我如。」這是他自我鞭策與勸勉後進的話。他讀書勤，全心沉溺，這些都是恆與精的功夫。大家不宜忽略梁氏是憑學問文章，使群倫翕服，使自己成為一位卓然有成的報人。

## (三)風骨

風骨，就是高尚品格。

近代報人中，若論風範巍然，楷模足式，梁啟超當為其一。

唯品格高尚，不在於日常嘵嘵空談，而應驗之於實際行事。梁氏接受考驗，有極為突出的一例：

民國四年，袁世凱僭謀稱帝，楊度等組織籌安會策動。梁啟超深為反對，著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一文抨擊。文章尚未發印，袁世凱的來使已上門。梁氏回憶：

當吾文章草成尚未發印，袁氏已有所聞，託人賄我以二十萬圓，令勿印行。余婉謝之，且將該文錄寄袁氏。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，謂君亡命已十年，此種況味亦既飽嘗，何必更自苦。余笑曰：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，余寧樂此，不願苟活於此惡濁空氣中也。

時袁世凱勢力正盛，樊籠之下，言出禍隨，何以梁氏不顧及生死利害？他說：「因學國正氣銷亡，對於此大事，無一人敢發正論，則人心將死盡，故不顧利害生死，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

業報代近與超啟梁

欲言之隱耳。」

這是孟子所說的：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見出報人的風骨嶙峋！」

另有一件事，亦見出梁啟超品格高尚。

光緒廿六年（一九〇〇年），梁氏赴檀香山，有華僑女性何蕙珍，學問志氣，均逾尋常，眼界頗高，獨對梁啟超印象深刻。

啟超時年廿八歲，感服對方才學，情感上亦起波瀾。據他自述：「近年以來，風雲氣多，兒女情少，然見其事，聞其言，覺得心中時時刻刻有此人，不知何故也。」其記事詩三首，如下：頗婉年來負盛名，天涯到處有逢迎，識荆說項尋常事，第一相知總讓卿。

其二：

眼中既已無男子，獨有青睞到小生；為此深恩安可負，當廷我幾欲卿卿。

只是梁氏於兒女私情頗能克制，做到「發乎情而止乎禮」，另一首詩的心境便自不同。

其三：

猛憶中原事可哀，蒼黃天地入蒿萊，何必更作喁喁語，起趁雞聲舞一回。

絕：

當時友人有意說合，梁啟超義正辭嚴予以拒絕：君所言之人，吾知之，吾甚敬愛之，且特別思之。雖然，我嘗與同志創立一夫一妻世界會，今義不可背。況余今日，為國事

奔走天下，一言一動，皆為萬國人所觀瞻，今有此事，旁能豈能諒我？這種言行一致，自尊自重的做人品格，使人肅然生敬！

## 訂出辦報南針藍圖

自梁啟超以士人之聲光地位投身報業，中國報業之革新進步，由是啟始。

自梁啟超藉報章以啟迪民智、開通風氣，政治社會變革之樞機與焉旋動。

梁氏之創辦報刊，有如巨石投江，激起層漲繼湧波瀾，產生宏大而深遠影響，其個人事功成就，堪稱是中國報界第一人。

只是梁啟超的辦報興味，始終弱於他的政治興味。士人之辦報，因不能展佈經綸，大用於世，乃退而論書策以自見。其用心非以報刊為目標，僅借之作手段而已。

士人飽受儒家薰陶，以從政為分內事。因而，梁氏於王陽明、曾國藩之合學問與事功為一，輒引為理想人物；對王安石之變法救弊，亦備極景仰，又以「中國之瑪志尼」自擬。

時歐洲報社主持者，多為政黨人物。在野時辦報，執政時則入閣。「朝罷樞府，夕進報館」，「昨為主筆，今為執政」，梁氏對此頗為激賞。

顯然，中國近代報業因缺少全心全意致力奉獻的專業報人，而未能健全發展，雖然，梁啟超的報人地位不可搖撼。

（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

與康有為共同從事變法活動時的梁啟超。